

书林漫步

林纾与张之洞交游二事考辨

□杨亿力

著名学者汪辟疆以治近代诗享誉海内。他的《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以笔记的形式,收录、整理了大量清末民初诗坛掌故。其中“林琴南佚诗”一节记录了“林纾《感事》诗触张之洞忌”及“张、林在京相见”二事,似乎尚未被学界所重视。然而,参照张、林二人生平事迹,又可见汪氏的记录存在诸多不合情理之处。本文对上述二事进行初步的考辨,以期对相关问题的明晰有所裨益。

由《感事》诗引发的龃龉

《旁记》“林琴南佚诗”引《畏庐琐记》,收录林纾逸诗《感事》一首:

甲申马江之耻,余曾有《感事》诗云:“禁垣特简出群才,父老倾城洗眼来。画省香炉夸侍从,赤车院牒耀舆台。期门秋老军容冷,夜月芦花鬼哭哀。自是符离关小劫,魏公鼻息正如雷。”偶尔感喟,出之无端,弃去不复存稿。不意竟为同里王某所闻。

中法马江海战后,林纾作诗一百余首,“类少陵天宝乱离之作”,但“逾年则尽焚之”(张儋《畏庐文集序》)。《感事》是少数传世之作。据说,林的同乡王某后以此行谤讪事:

数年后,适某相国督粤,见余代王福昌所拟《火药条陈》,大赏其精彩。立召人,询稿所出,王以余告,相国大为激赏,赏于广生称之。已而询及同里王某,王力诘余,且诵此诗以触相国之忌,于是复加怒骂。

王福昌乃林纾好友王寿昌之兄,曾留学法国学习火药技术,回国后为火药专家。《火药条陈》不见于林氏文集中。据汪辟疆所言,某相国即张之洞。若干年后,林纾才知晓此事:

及祥符沈公督学闽中,累擢余高第,以积劳卒于官,因挽以联云:“吾师大节,得司马公一字之诚,生平兼道学儒林,余渚犹沾循吏传;闾士私传,与宋文正千秋为偶,戮子尤感恩知己,斜阳独吊去思碑。”此联为上海《万国公报》所转载,相国复之,谓闻人郑君篋云:“某某富有才笔,惟持论不公耳。”郑君举以告,余均一笑置之。

书友品书

《诗经诗解》:诠释的承续与创新

□翁晓君

由于孔子删在前,汉人推崇在后,《诗经》成为“六经”之首,而《诗经》学经历汉学(汉唐)、宋学(宋明)、清学和“五四”以后的现代诗学等发展时期,一直是学界研究阐发的重点、热点。《诗经诗解》则是许总教授在新时代诗学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

“五四”以后,大批学者为恢复《诗经》文学真面目进行努力,他们颠覆经学体系,奠定了新文化的根基,而《诗经》则首当其冲。他们达成了共识:《诗经》是文学,不是经。由此便为《诗经》的研究定了基调,开创《诗经》新学。他们重视《诗经》文学性质,否定了《诗经》之为“经”,也就彻底否定了“旧经学”,自己也可能掉进了“新经学”的泥潭。时至今日,配君子的淑女变成了劳动姑娘,君臣间的劝谏变成了劳动者的怨辞,甚至被写到古代文学教科书中,则是以新的谬误代替旧的谬误。

许总教授《诗经诗解》在考察和评鹭《毛诗序》《毛诗传》《毛诗正义》以及《诗经》新学诸家谱说的基础上,“务求古人作《诗》本意”,尽最大可能恢复《诗经》之本

来面目。例如《周南·关雎》,“毛说作于文王之世以在德妃,齐鲁韩三家说作于康王世德衰作讽”,但是近世认为是“纯民间恋歌”也是不妥的。因此,《诗经诗解》作解诗云:“关雎诗开本人伦,易道乾坤万物循。毛氏德妃三氏刺,威时乐正理同缘。”“岂知‘窈窕’状宫室之深,‘君子’‘淑女’于《诗》亦非庶民之谓歟?且琴瑟钟鼓之礼仪,又岂属民间之所用者乎?”

又如《邶风·式微》,《毛序》《郑笺》认为是黎侯寓卫,其臣劝归之辞,而近人或以为“苦于劳役者对国君发的怨辞”,或以为“情人幽会相互戏谑之情歌”。《诗经诗解》作解诗云:“九黎盛势已衰微,赤狄兵兴国祚非。臣尽忠忧君不悟,苟安卫邑曷能归。”作者赞同前人说法,认为:“则不独有臆测之嫌,且于诗之辞,似尤而不通。试想,苦于劳役或情人幽会,何以重言‘式微’?”至于后世衍“式微”为“归隐”,隐逸文学遂蔚为大宗。

又如《周南·兔置》,《诗经诗解》作解诗云:“柝柝丁丁施道谱,干城卫邑腹心

饮谈笑及统领海宇营张镇军得胜,迎接时队伍不整,特乏茶火之容……

“张幼樵钦宪”即张佩纶。张氏到闽时,士民争睹其容颜,与次句“父老倾城洗眼来”相合。诗的次联分别化用了杜甫《秋兴八首·其二》中“画省香炉违伏枕”与《后出塞五首·其四》的“照耀台舆”来描画张氏神采。“画省”即中书省。“赤车”指显贵者乘坐的马车。“舆台”指奴仆,与第三句的“侍从”相对应。而“夸侍从”与“耀舆台”意在从侧面夸赞张佩纶——连仆从都如此气派不凡,其主人的风采更可想而知。

颈联却话锋一转,直言军容不整之事,即《述报》中所言:“闻钦宪谈及统领海宇营张镇军得胜,迎接时队伍不整,特乏茶火之容。”继而提及战败后的萧瑟与凄凉。尾联则以典故的方式暴露诗人的态度。“符离关小劫”典出南宋孝宗年间的“隆兴北伐”。隆兴元年(1163年),由于指挥不当,宋军在符离一役惨败后便全线崩溃,导致宋廷不得不再次屈辱地与金议和。末句中的“魏公”即“符离之战”中宋军主帅、魏国公张浚。其与张佩纶同姓,有暗指之意。

“鼻息正如雷”化用了苏轼词作《临江仙》中的“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这一方面抨击“主兵者”漫不经心、视战事如儿戏的态度,另一方面,“鼻息如雷”本指家童,也流露出诗人以“竖子”贬斥主将之意,语气近似于谩骂。因此林纾才觉得“出之无端”,立即“弃去不复存稿”。

平心而论,《感事》在诗艺上并不出彩。若排除他人恶意曲解的因素,《感事》似不应触张之洞之忌。因此,此条记录在真实性上值得推敲。

张、林在京交往

《旁记》还引林纾《畏庐琐记》,记载了若干年后张、林在京相见之事:

余于前清某科应南官试,文中偶用《管子》成句,曰:“诸侯皆令已,独孤国非其国也。”某相国以淹雅称,被命为总裁,将令字下一巨点,斥曰:“不通。”后余睹落卷,茫然。后十年,余至京师,相国忽以人介绍,与余相

见,出王廉州及石谷画册见示,过从甚欢。一日,相国忽问曰:“君曾应春闱乎?”余曰:“老母见背,遂不北来。”相国曰:“仆为总裁时,君亦在试否?”余笑曰:“第三艺用《管子》,公斥为不通,故未获售。”相国大取措。余大笑,乱以他语。相国曰:“老悖,老悖。”

林纾于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后,曾六次赴京参加会试,故以《管子》制艺应发生在1898年。林纾与张之洞见面,是在该场考试“后十年”,即1908年。张之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到京奉旨管理学部事务,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病亡。此间,林纾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林、张二人若在京相见,当有可能。

但是,上述记载也存在明显的不合情理之处。首先是时间。据上文所言,林纾参加会试的时间为光绪八年至二十四年,然而此间张之洞正任职于两广与湖广,必无法在京总裁科举。实际上,张之洞亦无主持科考的经历。

其次是《管子》成句。按文中口吻,林纾似乎对己文颇为自得,对“某相国”的批评深不以为然,而从“老悖”又可见后者似乎也承认改卷失误且懊悔不已。此成句出于《管子·霸言》篇:“天下皆理已独孤,国非其国也;诸侯皆令已独孤,国非其国也;邻国皆险已独易,国非其国也。”据清代考据学大家王念孙(1744—1832)的论述,“诸侯皆令已独孤”中的“令”当为“合”之讹误。此处的“合”乃结盟之意。

王念孙主要活跃于嘉庆、道光年间。其考据学著作在彼时影响极大。在会试中竟引讹误之句以制艺,可见应试者之孤陋,也无怪主考会“将令字下一巨点”,以“不通”斥之。若有留心于当时学术,定不会以此制艺并为傲,而“某相国”也断不会以“老悖”懊悔自责。因而,这条记录或出于他人讹传或杜撰。

有意思的是,汪氏《旁记》中关于林、张交往的记录皆引自林纾《畏庐琐记》。然而,《畏庐琐记》皆无记载。究竟是现今流行的《畏庐琐记》尚有遗佚,抑或是他人的杜撰而导致汪辟疆先生的误记,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辨析。

(作者单位: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新书纵览

《文物中的鸟兽草木》

刘敦愿 著 郑岩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于古代器物与画像中的鸟兽草木,映现着人们与自然界生物丰富密切的关联,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含义和艺术脉络。本书通过描述这些图案、纹样的风格,剖析其意义,推想古人对自然资源的认识、改造与利用,复原彼时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追踪古族的征伐与迁徙,再现悠远的宗教礼仪与信仰,呈现考古材料多方面的价值。

《日常的弦歌》

王尧 著 译林出版社



仅存8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高峰。确凿详尽的日记、会议记录、薪金收入、回忆录……作者另辟蹊径,于日常生活中聆听弦歌,传奇于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讲述。西南联大寄托着我们的大学理想,而西南联大何以可能,大学之道何以相传,知识分子何以自处……这些问题延续至今,文明之火亦借此而光焰不熄。

《中文打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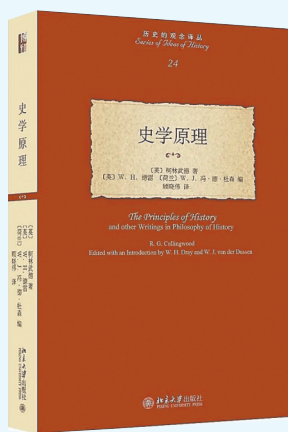
墨磊宁 著 张朋亮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现代以来,汉字作为非字母文字,在技术语言现代化的过程中遭遇了来自字母文字中心主义的重重阻碍,其一是无法适应西式打字机。本书通过讲述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历程,展示了汉语世界的机械革命,探索了中文寻求生存、适应且影响科技变革的历史,反映了中文如何突破字母文字霸权而融入全球化信息时代,重新获得独特地位。

《史学原理》

柯林武德 著 顾晓伟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柯林武德被誉为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而《史学原理》是柯林武德生前计划作为《历史的观念》的姊妹篇共同出版的另一卷历史哲学著作,并对其寄予厚望,甚至视为毕生之作。遗憾的是,柯林武德去世前只完成了写作计划的三分之一。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宣布发现《史学原理》手稿,本书即根据这份手稿编辑而成,同时还增补了8篇柯林武德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未发表的手稿和笔记。

灯下漫笔

独湛性莹的遗民诗

□刘丹

明清时期,以隐元禅师为核心的黄檗禅僧从福建东渡日本,创立黄檗宗。其中,隐元的第十八位法嗣独湛性莹是黄檗临济正宗第三十三世,担任京都黄檗山万福寺第四代住持,在日本弘法长达52年。

独湛俗姓陈,名其昌,明崇祯元年(1628年)9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黄石里(今莆田市黄石镇)。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独湛再次拜访福清黄檗山,从此随侍隐元禅师。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6月21日,跟随隐元禅师从中左(今厦门)乘船东渡日本,时年27岁。隐元禅师主持长崎兴福寺和大阪普门寺期间,独湛一直随侍左右,助其弘法。日本宝永三年(1706年)正月,独湛在黄檗山塔头狮子林院圆寂,世寿79岁。

独湛性莹出身世世代代儒儒之名门,其先祖不乏德才超群之人,南宋名相陈俊卿、民族英雄陈文龙、明朝以孝廉名世的御史陈茂烈皆为其先祖。祖父陈希振为贡元,父亲

陈翊宜亦业儒,外祖父黄若水为秀才出身,道德文章俱佳,被称为“盛德君子”。在此家世背景下,独湛从小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儒家的孝道思想对其影响很大。

独湛性莹16岁出家后至24岁拜隐元为师前的文稿汇编《梧山旧稿》,收录了《先妣孝慈黄孺人割股记》等多篇纪念祖先亲人的文章。东渡日本后也因思念父母与先祖,“间取诸祖传记而熟读之。其德音景行,观感兴起”,继而编撰《永思祖德录》记载陈氏门中64位先祖的嘉言德行并进行赞颂。

不仅如此,独湛还建造永思堂和永思塔来祭祀祖先。永思堂又叫报恩堂,坐落在初山宝林寺附近,堂内奉有陈氏历代先祖的灵牌。他还在宝林寺大雄宝殿的东边建造父母的坟墓,命名永思塔。之后在京都黄檗山担任住持期间,又在黄檗山塔头狮子林院旁边建造了外祖父父母的墓塔,碑文为:“外王父母,鞠养洪恩。报恩罔极,立石着存。”独湛虽出家为僧,却不弃明伦,出

家不忘孝道,不但辑录祖先的嘉言懿行,还为祖先建造祠庙,为长辈营造墓塔,慎终追远,可见儒家的孝道文化对其影响深远。

独湛虽出家为僧,但在明清易代之际,面对异族入主、故国灭亡的混乱世局,仍会感到悲痛和无奈,看到生灵涂炭、文化备受摧残的悲惨情景亦会燃起怜悯之情,深厚的遗民情结在许多作品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崇祯甲申年国变》中写道:“日月开明运,光昭三百年。腥氛涂宝鼎,国祚起狼烟。”其中,“光昭三百年”表现出独湛对300年来明王朝统治的肯定和怀念之情。“腥氛”和“狼烟”则反映对清军人关所造成的血雨腥风和民不聊生的持续强烈的态度。他面对国破家亡的无奈现实,即事而歌,吟唱出内心的痛苦与悲愤。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独湛得知崇祯皇帝驾崩后,作诗《野哭》:“帝御大宝舍始生,帝归兜率余已僧。民丧考妣僧无佛,北望煤山焰自腾。”感叹世事无常,对崇祯

观之,《伐木》之礼,当在友道,实不必拘于天子或者庶人之作。”

《诗经诗解》亦擅于延伸和阐发,引出普遍之义,令人思索。如在评论《小雅而无正》时,作解诗云:“天道乖戾王祚迁,宗庙百御散如烟。居平唯诺临危避,始信世情一脉延。”诗言君王昏暴,群臣自私误国,认为“诗之所指,似仍以幽王之世为宜”,进一步指出“居平既多唯诺,临危又巧于避谗”“又岂必幽王一世焉”。又在评论《王风黍离》时,作解诗云:“黍离离离漫四陲,宗周宫室瞬间移。可怜文武千秋业,不敌幽王一宠姬。”颇有唐人咏史诗的韵味。

《诗经》所含内容博大,包含历史、哲学、文学、经学、民俗等。《诗经》阐释史大致可以分为文学阐释史和经学阐释史,清代以前以经学阐释为主,近代以来以文学阐释为主,而两者不可完全分裂。《诗经诗解》则秉承“文学与伦理之融合一致”的理念,不割裂文学与经学,摒弃历代学者所受所处时代思潮之桎梏,客观分析诗之本体,更真阐释了《诗经》的双重价值。